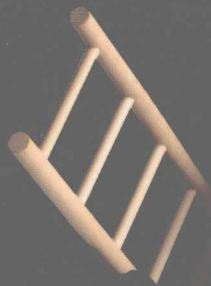


# 向死而生

一个惩罚与救赎的故事

IN THE PLACE  
OF JUSTICE

A Story of Punishment and Deliverance



威尔伯特·里德欧 著  
Wilbert Rideau

张途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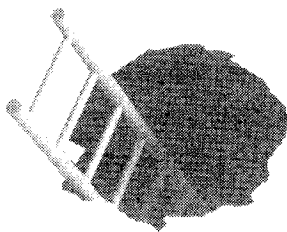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向死而生

一个惩罚与救赎的故事

IN THE PLACE OF JUSTICE


A Story of Punishment and Deliverance



威尔伯特·里德欧 著

Wilbert Rideau

张 涂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死而生：一个惩罚与救赎的故事 / 威尔伯特·里德欧著；张途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620-4063-7

I. 向… II. ①威…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2742号

---

- 书 名** 向死而生——一个惩罚与救赎的故事  
XIANGSI ERSHENG YIGE CHENGFA YU JIUSHU DE GUSHI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zf5620@263.net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25(发行部) 58908334(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720mm×960mm 16 开本 20 印张 325 千字
- 版 本**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4063-7/I·4023
- 印 数** 0 001-3 000
- 定 价** 39.00 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印刷厂负责退换。

## 作者笔记

这本书中所有引用的材料都来自于法庭证言，既有我作出的也有其他人作出的，既有已经发表的材料也有我自己尽最大可能的追忆。我以最大的谨慎来确保这些字里行间所有的对话都忠于原内容，即使不总是字字精确。

**In the Place of Justice: A Story of  
Punishment and Deliverance**

by Wilbert Rideau

Copyright © 2010 by Wilbert Rideau

All Right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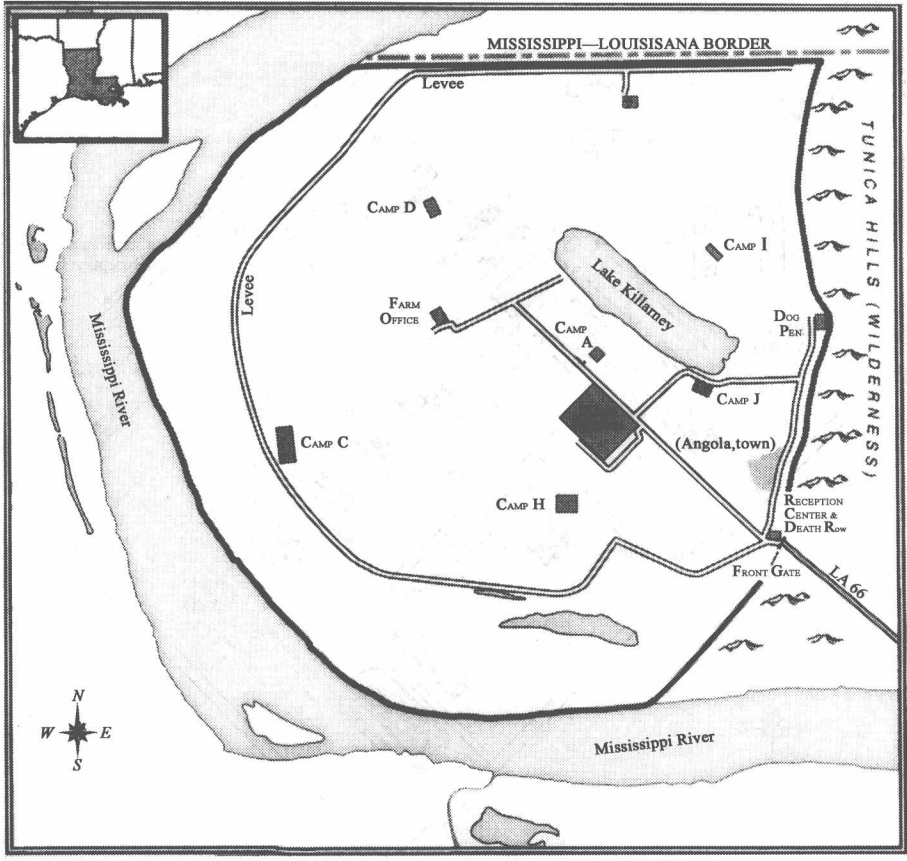
本书由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授权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 - 2011 - 6735 号

献给 C. 保罗·菲尔普斯，  
我的导师和朋友

成功是相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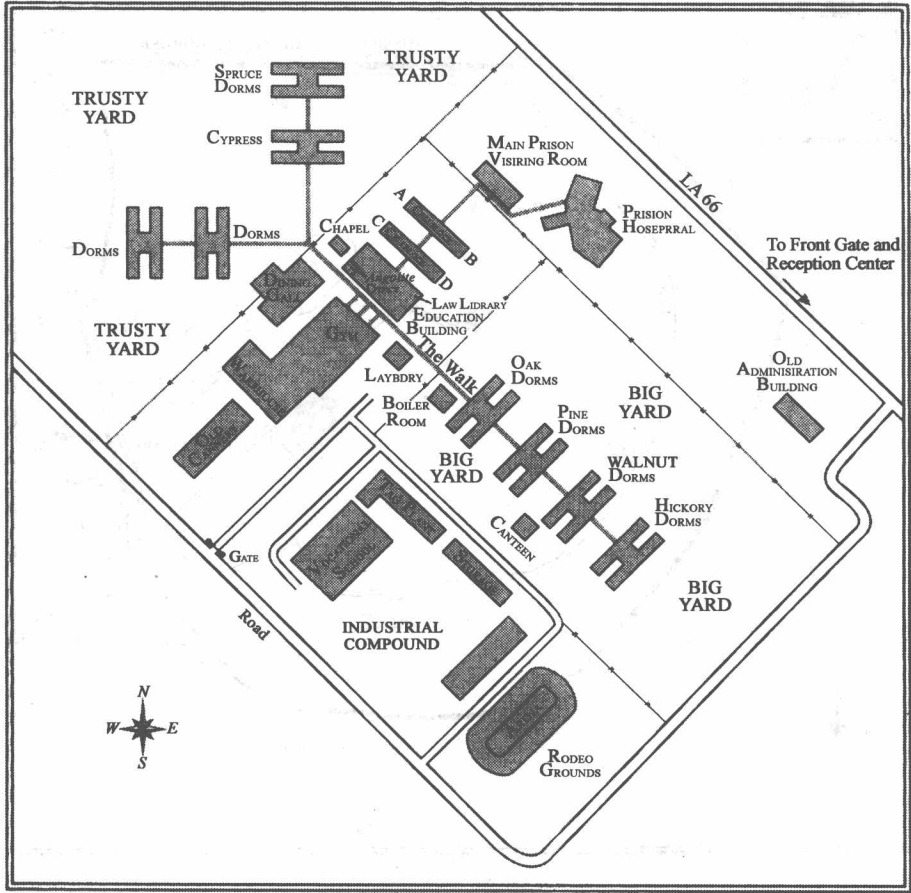
它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处理混乱的局面。

——T. S. 艾略特



安哥拉 (Angola)





主监狱 (Main Prison)



#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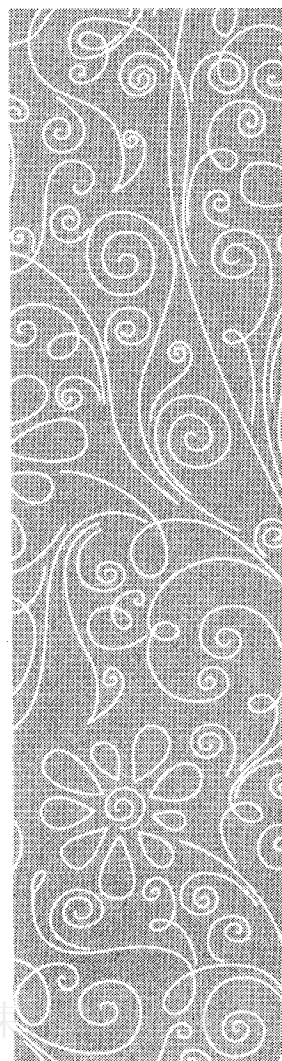


1. 毁灭.....	1
1942 ~ 1961	
2. 苦难.....	28
1962 ~ 1970	
3. 孤独.....	54
1972. 01	
4. 丛林.....	66
1973 ~ 1975	
5. 导师.....	94
1976	
6. 镇压.....	112
1976	
7. 真实.....	129
1977 ~ 1981	



# 目录

# CONTENTS



8. 幻象	142
1981 ~ 1986	
9. 坚持	160
1986 ~ 1990	
10. 希望	185
1990 ~ 1994	
11. 审查	208
1995 ~ 2001	
12. 敌后	229
2001 ~ 2005	
13. 救赎	262
2005	
14. 天堂	287
2005	
致 谢	306



## 毁灭

1942 ~ 1961

“杀了那个黑鬼!”一个凌厉的声音划破了这个冬夜。

州警官汽车的前灯照得我阵阵眩晕。脚上就穿着长袜，我被拷在双车道的路肩，站在警车前灯和我被勒令靠到路边前开的小车的尾灯之间。窃窃私语就像捕猎的气息一样在阴影下的一小撮人群间迅速传播，在路边的灯沿沙沙作响。我奇怪他们怎么能集合得这么快。月光下，一个年轻州警官用一只胳膊截住了正向我狂奔过来的一个白人男人，就是这个年轻的警官逮住了我，他正在用对讲机说着什么。不用看我也知道他们都是白人。

“把他交给我们!”其中一个高喊着。

“这个男孩由我们处理，赶紧离开。”另一个略显和善。

过了一会儿，随着围观人群的躁动，那个老的警官开始变得犹疑不决。我只感到害怕。年轻的警官小心地说：“你看，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向总部报告了，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抓到他，而且他们也在赶来的路上了，我们不能把他交出去，这样会没法儿交差的。”那



个老警察拨弄着他的手枪皮套，告诉围观的人群不能把我交给他们，但他保证我会被“妥当处理”的。

这只不过是苟延残喘，我确信这件事只会以一种方式结束。毕竟它发生在1961年，而且是在路易斯安那。

几分钟后更多的官方车辆到达了，这条道路被挤在一起议论的执法警官淹没。两个地方治安官副手过来，粗鲁地抓着我的胳膊，将我塞进了警官的车里。其中一个红脸的用力把我推搡到了后座。在他爬进来的时候用牛仔靴猛踢我。“嗨，嗨，别这样，”那个老警官说，“我们还得带他去见治安官呢。”

“反正他也不过是个狗娘养的。”那个踢我的警官说。他倚靠在座位上，用脚压得我动弹不得。警察们一路开车无话。当这辆车慢速转进了爱荷华一个小城镇边缘的加油站时，我怀疑这是否就是他们要杀了我的地方。恐惧几乎让我灵魂出窍。

那个副手粗暴地把我带进了一辆有两个大块头白人的车里，他们出来跟那个带我过来的人交谈。我的手被铐着，一个人坐在后座上。那两个大块头白人回到车里在前座坐定后，转过身来自我介绍：司机叫亨利·A·小里德，我们所在的教区——卡尔卡西尤的常任治安官；另一个是他的副手查尔斯·巴里奥斯。这个治安官问了一些问题。

我的名字？威尔伯特·里德欧。地址？查尔斯湖布里克街1820号，不对，这是我妈妈的地址。年龄？十九岁。我在南门购物中心的哈尔鹏纺织店工作。

巴里奥斯走出了汽车进了加油站。

“枪在哪儿？”里德问。

“扔了。”我说。

“你还有什么其他武器？”

“一把小刀。”

“在哪儿？”

“扔了。”

巴里奥斯回来了。“他们正抓住他母亲把她带到监狱去”，他告诉治安官。

“我母亲和这件事毫无关系。”我警觉地说。

“好吧，但你得帮我们弄明白这一点。”里德说，“你可以从指给我们那把

枪和小刀扔在哪里开始。”我带着他们离开高速公路，驶回原来的马路，直到到达事发地点。在黑暗中，他们没法在茂盛的野草中找到武器。30 分钟后，历经 11 英里的路程，我们到了查尔斯湖，一个拥有 63 000 人的正在崛起的石油城市。

四层砖制的监狱就建在城里主要交通要道莱恩街和政府大楼后面。里德驶过政府大楼，看到上百个白人聚集在监狱前时突然停车。

“我们不能从前面穿过去。”巴里奥斯盯着面前的景象说。

“试试后门。”里德一边说一边倒转了车头。

人们认出了治安官的车辆，开始向我们跑来。我的心跳就和里德急转弯驶车赶离聚众人一样快。

我是在南部长大的，那里有萦绕黑人的噩梦——世代相传的对被白人杀死的恐惧。我们见过照片，听过故事。他们会打我，踢我，然后把我在政府大楼前草坪的树上吊死，阉割我，在我的尸体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火。而白人会在火焰前狂欢。然后他们会砍掉我的手指和脚趾，残忍地作为“白人正义”的纪念品。他们还会把我身体剩下的部分作为警醒之物陈列展示。

“你会把我交给他们？”我问治安官。

“那是不可能的。”他回答。他对车里的广播自言自语，然后关掉前车灯，车辆缓缓地向监狱滑行，在靠近监狱后面有大面积灌木丛旁的停车场停了下来。巴里奥斯离开车开始侦察这个位置。

“治安官，你不会把我的母亲带给那边的人群吧？”我问。

“她会没事的。”他说，专心的盯着街道。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但你要跟我们合作。很多人现在都对你很生气。我们越快了解事情的真相，就能越快作出解释和安抚人心——这样你的妈妈就能回家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我们安静地坐着，直到巴里奥斯回来。“可以从后面进去，”他说，“但动作得快。”

治安官加大油门，向监狱后面不引人注目的铁门加速。他和巴里奥斯跳出汽车，一个人架着我的一条胳膊，把我像三明治似的夹在中间，快速通过铁门，而我的双脚是悬空的。当他们英勇地把我带进政府大楼时，我甚至在看见监狱大厅前沸腾如海的白人前就听见了他们的怒吼之声。站在门厅面对他们的是更多的白人，穿着制服，握着枪——足够多的枪。



办公大楼的门关上了，留下我和几个人。巴里奥斯摘了我的手铐让我在木桌旁坐下。他递给我水和香烟，我接受了。治安官很快回来了，拉了一把椅子正对着我坐下，问我是不是还好。我点了点头。

“我需要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和蔼地说，“从头开始说。”

格拉迪斯·维多利亚出生于1924年1月8号。那时正是美国战后的繁荣期和充满希望的时代：电话那时已经被广泛使用了；第一个有执照的常规广播刚开始；第一部有声电影刚在纽约的里沃利剧院上映；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刚被修正，赋予了妇女选举权。

然而，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却在格拉迪斯的生活中无影无踪。更切身地影响她世界的是三K党的暴力复活以及为了镇压有色人种而发起的恐怖活动，还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组织的成员在她出生的那一年达到了十万人，并且正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向南部和中西部扩散，控制着许多地方和州政府。有色人群们终日活在惶惶不安之中。

格拉迪斯是维克多·维多利亚和安娜·古勒瑞的14个孩子中的一个，这对夫妻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型白人城镇劳泰尔外部有色人种农场社区的成员，那里的佃农里说的是克里奥尔语。维克多和他的家人、他的动物们一起生活在一个农场上，不花白人地主一分钱，但地主却能从每年的“经济作物”——棉花、大豆和爱尔兰土豆中得到利润分成。

佃农耕种是很辛苦的工作，但当1929年华尔街的股票价格暴跌引发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时，正如许多在“可怕的三十年代”中以农场为生的人一样，维多利亚一家逃过了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经历的艰苦、匮乏、饥饿和噩梦。他们不仅能种植和栽培自己需要的东西，还能卖给别人。

“我听说了人们如何受苦，甚至看到人们在救济汤前排队照片，他们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格拉迪斯回忆着，“但我从没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我们总是有充足的食物，家里从来没有人挨饿。”

佃农耕作也使得维克多和安娜能负担得起孩子们的教育。孩子们在破晓时分起床，做给奶牛挤奶这样的家务，然后去学校。他们可以在早上8点前到达学校，然后下午3点左右回到家，之后在农场工作到日落。那样的生活不会给他们留很多做家庭作业的时间，但是善解人意的老师会给学生们在学校留一点时间做家庭作业。学校在五月份学期结束，孩子们就加入父母在农

场的全职工作，直到九月新学期开始。

学习着从劳泰尔的白人学生中传下来的老教材，格拉迪斯——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是维多利亚家族里第一代能读会写的——在劳泰尔有色人种小学上学，这个小学有“隔板隔出的五六间房，一年级一个房间”。唯一给有色人种的孩子们提供更高水平教育的学校在7英里之外的奥普劳萨斯镇。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有色人种家庭都用马匹、小推车或者马车作为每天上下学的交通工具，那样的路程令人畏缩，所以格拉迪斯就加入了她的父母行列，成为了一名农场的全职工人。

维多利亚家族从经济萧条期中享有的自由是有代价的。获得收成需要整个家庭的努力。“在农场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体力劳动。”格拉迪斯回想着，“我们没有拖拉机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只有用骡子或者马匹工作，所以我们这些孩子都想出去，只要可能，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离开。”

像她这样的女孩儿的生活是被保护的，不管她们去哪里，都被监护着。礼拜天的教堂是一周来最大也时常是唯一的社交活动。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聚会，只时不时的有个婚礼或者学校舞会。逃脱意味着要嫁给第一个出现的正派的男人。“那时候，爱情不是女孩子结婚的主要原因。”格拉迪斯说。她的机会在她十六岁那年出现了。

费迪南德·里德欧一家在1940年决定举家搬迁到劳泰尔之前一直生活的十几英里之外的普莱森斯镇。“啊，他是个魁梧的男人，有一辆闪闪发亮的崭新的黑色小马车和一匹大块头的马。”格拉迪斯回忆。她在当地舞会中认识了里德欧家孩子中19岁的托马斯。她喜欢跳舞，而托马斯擅长这个。因为他们住的很近，托马斯很快就加入了维多利亚家姐妹，周日上午一起徒步去附近唯一的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允许黑人们坐在后排的长凳上。之后，他们会去杂货店，托马斯会在那用5美分的糖果或者冰激凌蛋卷筒招待格拉迪斯。“汤姆是个穿的蛮时髦和整洁的人，而且也有分寸。”她说，“我喜欢他。”他很快向格拉迪斯求婚了。

只认识了3个月，托马斯和格拉迪斯就在1941年的春天在她父母家结婚了。根据托马斯的哥哥莱尼斯的说法，托马斯之所以这么快想跟格拉迪斯结婚，是因为他让海湾向南6英里之外的让约特的一个姑娘怀孕了，但他不想娶她，因为她的肤色太深了。而格拉迪斯却有着长长的软软的黑卷发，有着苍白得可能被误以为是白人的肤色，这使她看起来对于一个充满种族意识的



克里奥黑人来说更称心。

为了挣更多的钱，几个月之内，格拉迪斯和托马斯加入了托马斯曾为一个老黑人工作过的让约特的砍甘蔗的移民工人的行列，他们在那工作直到丰收季节。这个老人喜欢托马斯，希望他们留下来照顾他，并告诉这对新婚夫妇他将在死后把这个地方留给他们。“它是一个又大又旧的破房子，显然没有被很好地照管。”格拉迪斯回想，“当你拍打玉米壳的床垫时，就会腾起一层灰尘。我们有一张行军床，我和汤姆就睡在上面。我们把煤油放在床的木腿处这样蚂蚁就不会爬到床上了。在那举目无亲，视力所及都是甘蔗，太多太多的甘蔗，在收获季后我们离开了那里。”

他们回到劳泰尔和她的父母一起生活了，我就出生在 1942 年。然后很快我们搬到德昆西西边 17 英里之外生活了，因为我父亲在那得到了一份铁路上的苦力活儿。之后，他在德昆西南部 18 英里外，就在查尔斯湖西边的一个硫磺炼油厂工作。当他在 1944 年被征兵后，我们跟着他到了加州的奥克兰。战争结束后，他退伍了——他其实从没亲历过战争——我们回到了劳泰尔的维多利亚的家。1946 年我的两个弟弟，雷蒙德和罗兰德出生了。

更多的短期工作找上了我的父亲，先是德克萨斯阿瑟港的炼油厂，然后是查尔斯湖的纪念医院，我母亲在那里以一天两美元的报酬为一个富有的白人家庭做家务。我们简单地租了房，然后托马斯以 245 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大块紧邻老墓地旁的土地，还花 150 美元买了一幢三间房屋并排的房子，他把它们都转化成了财产。“一旦他得到了更多的木材他会在这之上再增加，”格拉迪斯回忆，最终扩大成布里克街上 1820 号的那一座五间屋子的房子。我的妹妹佩尔蕾妮出生在 1947 年。

表面上看，我们这样一个由辛勤工作的丈夫、父亲支撑着的家庭很正常。我们从未落下去教堂或学校，被教育着要注意举止、穿着整洁，要善于合作，要有礼貌，并要对长辈和比我们更好的人表示尊敬。但这一切的背后中还隐藏着阴暗的一面。

自从我的父亲从让约特的第一次甘蔗收获季回来后，就开始酗酒，和新认识的粗鲁的酒肉朋友聚会。他第一次打我母亲是在我出生一年后，因为她责怪他总是去充满酒精和放荡女人的乡村酒馆。寻花问柳是里德欧家男人的典型特征，但我的母亲从未在她父母家目睹过暴力行为，这一点让她不寒而栗。她是一个单纯、没受过多少教育也没多少收入的乡下姑娘，那时身边带